

追寻真实的 民国

匡正讹传多年的民国故事 揭示改变命运的关键细节

曾业英 著

有几份材料说几份话，材料本身就可靠吗？

小到小凤仙的风流逸事，大到张学良的东北易帜

权威专家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追寻真实的 民国

匡正讹传多年的民国故事 揭示改变命运的关键细节

曾业英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真实的民国 / 曾业英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08 - 2118 - 9

I. ①追… II. 曾… III. ①中国历史 - 民国 - 文集

IV. ①K258.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6991 号

追寻真实的民国

作 者	曾业英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2118 - 9
定 价	36. 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本书所选11篇文章，是我在学习和研究民国史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心得，大多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专业刊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发表过。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许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求真。换句话说就是追寻真实的历史。不管它们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可自我告慰的是我勉力而为了。因为所涉皆为民国时期的史事，所以将这本小书命名为《追寻真实的民国》。

研究历史，首要的任务是求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问题。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650页）。这是当下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可以说已听不到什么人有异议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就个人的体验，似乎只有完整地走好以下研究过程的每一步才有可能。

首先，在入手研究某一历史问题之前，除了必要的理清前人的成果，掌握相关信息之外，必须树立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思想，“清空”思想中一切先入为主的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观念，不仅要抛开前人在一定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观念，还要抛开今天有些人在某种所谓“现实需要”的影响下不顾历史条件和事实所形成的观念，更不能预设某种想当然的观念，以保持大脑的“一片空白”，为“还原”历史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791页），真实的历史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想当然的预设，明显违背了事物认识的一般规律。经过独立研究，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是前人还是今人的成果，均可也应全盘接受，否则，便只能弃而舍之，服从真理了。

其次，要充分占有史料，而且是原始史料，不是他人解读过

的饱含其价值取向的二手史料。何谓“充分占有”？一是要有一定的数量，形成证据群和证据链，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件支离破碎的孤证。二是要有一定的门类，尽其所能，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如原始档案、当事人日记、来往函电、同时代的报刊舆论、社会传闻、音像录存、个人回忆、调查材料、有关文献和实物，等等，形成综合证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还要正反兼收，不能只搜集与自己认识一致或所谓“正面”的史料，而忽略甚至拒不搜集认识完全相反或所谓“反面”的史料。三是不仅要占有所研究的历史问题自身的史料，还要进一步扩大搜集范围，占有与其关系密切的上下、前后、左右所有有关问题的史料，以便追寻它们与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

第三，更要认真考辨史料，绝不可认为只要事事有出处，并非自己杜撰就行。要从大量记载中，整理出准确、可靠的史料，而且要忠实使用这些史料，不能断章取义。因为各种公私记载，不论出自何人之手，从来“都有它的立场。既有阶级偏见之不同，当权在野之不同，派别门户之不同，还有事实根据之不同，因而有关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记载各不相同。”（《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45页）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往往互相歧异，彼此对立。这就意味着这些公私记载，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半真半假的。不是有人一味强调档案的可信性吗？可是今天某些官员的档案，却“年龄愈改愈小，学历愈改愈高”，这样的档案能信吗？不是说个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会造假吗？可是谁能保证他记日记不是有选择性的？不会有意回避更重要、更恶劣的事和思想呢？这就有了一个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真之所以为真、假之所以为假的史料辨析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追寻真实的历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后，在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最终结果时，要特别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以今天的价值取向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为任何一件事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此条件下出现的事绝不可能同样出现于另一条件之下，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任何一个人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此条件下能做的事，另一条件下必定不能做，此条件下能成功的事，另一

条件下必定不能成功。二是必须以全面的眼光看问题，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第279页）个人理解，这“总和”和“联系”应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也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一生的全部实践，究竟有多少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有多少是有益于社会进步和符合多数人需要的，有多少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大局的，是30%还是90%，如果是后者就值得肯定，不必纠缠一时一事的是非得失。超越了这两个基本原则，就难说是历史真实了。

作为一次追寻历史真实的研究过程可说是到此结束了，但对历史自身的研究却不可能就此止步。因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既不容许有意识形态的曲解，也不容许有片面性或其他不实之词，更不是自以为真实就可获得公认的。由于这种客观的公认的认识，也可能仍然难免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第206页），而且即使客观的公认的认识也包含着相对性，需要不断充实和发展，加以每个时代都要求了解前天和昨天，以加深对今天的理解，而历史研究又是学术问题，更应允许人们提出异议，参加讨论，只有永远经得起异议，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真实。因此，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一定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就此而言，本书也只能是永无止境的研究航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缺陷和不完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入本书各文，大多照录原文，仅有两篇略有增补，但各篇的标题几乎都有改动。为方便读者查阅，原标题以注释形式附于页侧，原载刊名及时间注于文末。各文方括号内的文字为改正错讹引文的文字。这次结集出版得到九州出版社的帮助，谨此致谢。

2013年2月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

目 录

蔡锷与小凤仙究竟是什么关系？

001

● 世人都说小凤仙是“爱国名妓”，蔡锷与她的确“相恋”。袁世凯称帝时，蔡锷正是靠了她的掩护，才得以顺利逃出北京，回到云南发动护国战争，推翻“洪宪”帝制的。历史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小凤仙这个人？

蔡锷参加的是同盟会吗？

047

● 蔡锷是否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有的认为参加过，是在广西从事军事教育时参加的，根据是有他同时代的人，甚至亲历其事者的证言。但是，这些证言可靠吗？能采信吗？他参加的真是同盟会吗？

蔡锷支持过“二次革命”吗？

054

● 1913年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发动了“二次革命”。蔡锷对此持何种态度？有说他借调解之名行支持之实的，有说他持反对态度的，也有依违于二者之间，不加论定的，那么，他究竟持何种态度？真的支持过“二次革命”吗？

到底是谁发动和领导了云南护国起义？ 075

1915年12月，云南爆发反袁护国起义。谁是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说是梁启超、蔡锷的，有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还有说是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的，甚至有说是云南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的？等等。那么，到底是谁？

陆荣廷何以迟迟未响应云南护国起义？ 090

广西陆荣廷早有反袁称帝的思想准备，甚至具体谋划，却在云南“独立”两个多月后才宣布响应云南起义，这是为什么？真如梁启超所说，是他们早在天津谋划反袁起义时就预定好的时间安排吗？

新疆是怎样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 095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占领北京后，新疆杨增新第一个主动通电表示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他何以率先作出这一决定？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南京国民政府何以最终承认了代杨而起的金树仁的地位？

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的最后命运 103

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是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三大武装力量之一。1928年6月初，张作霖安国军战败后，他们成了关内唯一尚未被消灭的一部北洋军阀势力。他们会对未来作何选择？其最后命运又是什么？

张学良何以多次推迟东北易帜 ----- 114

1928年7月初，退据东北的张学良接受“和平统一”倡议，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东北易帜问题。但却一次又一次推迟易帜时间，经历整整半年的谈判，直至年底才正式宣布。这是为什么？张学良究竟有什么隐情？

蒋介石何以能取得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 154 -----

1929年3月26日，蒋桂战争正式爆发。结果是蒋介石取得全面胜利，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不但丢了武汉，还丢了后方根据地广西，被迫流亡香港。蒋介石何以能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仅仅是其实力远优于桂系吗？

如何辨别历史当事人记述的真伪？ ----- 181

历史当事人的记述，尤其是当时的记述，历来是历史研究者“还原历史”的重要依据。但是，无数经验又告诉我们，即使是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也不全是真实可信的，必须认真去伪存真。那么，如何分辨其中的真伪呢？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究竟怎样？ 212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伪统治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整整八年。在这八年中，这一地区的农村经济究竟怎样？是发展还是衰退？是繁荣还是破产？它给我们后人留下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

蔡锷与小凤仙究竟是什么关系？^{〔1〕}

〔1〕 本文原题为《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

一 缘 起

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因为比较严肃的历史论著似乎都不愿深谈或者回避这个问题。

1914至1915年蔡锷任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南城陕西巷云吉班一位自称“小凤仙”的风尘女子。在那个年代本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寻常小事，据时人说：“北人视狎妓为极平常之事，父子兄弟可以同往，不过借之以销长晷，未必尽有醉翁之意，故人人趋之若鹜。”^{〔2〕}但因这事正好发生在蔡锷京津脱险，海天万里，间关入滇，发动反袁称帝的惊天大事之前，于是便成了各种社会媒体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2〕 梦余：《都门忆语》，《小说新报》第1年第4期，1915年11月。

就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蔡锷这时确与小凤仙有所交往，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当时无论民间还是官场，对于此事均有传闻。不过，在蔡锷逝世以前，却没有发现关于此事的任何直接记载，甚至连“小凤仙”三个字也不见于各种报刊，仅仅偶尔见到事表明朗化以后，才能理解的零星半点暗示性记载而已。如与蔡锷暗中有联系的欧事研究会成员1915年10月10日创办的、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上海《中华新报》，就曾在蔡锷逝世以前含糊其辞地报道过蔡锷是“变服乘骡车出京”的。^{〔3〕}稍后，《香港时报》也在一篇时评中提及：蔡锷终于“天相豫州，犹能脱离曹阿瞒之圈套，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吾为蔡氏个人庆，吾为吾党前途贺也。雪巾车之耻，鞭平王之尸，勛哉。”^{〔4〕}两则报道都没有直接说出小凤仙的名字。据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哈汉章后来说，前者是他和刘成禺、张绍曾、丁槐等人在蔡锷离京后为洗刷他们与此事有关的嫌疑，故意“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的假消息。^{〔5〕}如无哈汉章这事后的说明，后人很难明白这两

〔3〕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详情》，1915年11月29日上海《中华新报》，第2版。

〔4〕 军魂：《时评二：蔡锷》，1915年12月6日《香港时报》，第5页。

〔5〕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则报道的真正含义，更难以知晓后者所云“巾车之耻”，实际指的也是上述《中华新报》所报道的假消息。所谓“巾车”，就是“有车衣遮盖的车子”，暗指蔡锷当日离京乘坐的是小凤仙的驷车。

但是，自191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以后，小凤仙的名字和形象便开始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和戏剧舞台上，并由此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个人迄今所见，在报刊上第一次明确提到小凤仙三个字及其与蔡锷关系的文章，是署名戒甫的作者撰写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它发表在蔡锷逝世后的第四天，即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的《文艺丛刊》上；在戏剧舞台上第一部涉及蔡锷与小凤仙关系的剧目《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也是在1916年11月12日这一天，上海《申报》刊出民鸣社的大幅广告，说“十七夜准演双出好戏，《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其广告词曰：“共和民国得蔡先生而更生，洪宪皇帝为蔡先生而竟死，凡我国民方冀先生身任艰巨，利民福国，不料先生从此去矣，痛哉。本社因即择先生如何反对帝制，如何寄情声色，如何摆脱侦探，如何出险起义，如何被刺不成，如何血战入川，如何再造共和，一一演诸舞台之上。我人〔国〕之人痛先生之死，若人人见蔡先生之事，而人人志先生之志，民国不死，则蔡先生虽死犹生，得不死矣，可不观乎？”紧随其后，民兴社也预告“念一（二十一日）晚准演双出好戏《蔡松坡》”，表示会“将蔡先生在京如何被帝制派监视，如何遣眷脱身，如何入滇举义，如何得病，一一演将出来”。^{〔6〕}而笑舞台则推出新编歌剧《筱凤仙哭祭蔡锷》，说“筱凤仙与蔡锷究有何等关系，筱凤仙何以哭祭蔡锷，恐知之者甚鲜，本舞台访得实情，编成斯剧……定于（十二月）十一夜开演”。^{〔7〕}蔡锷家乡湖南新剧社也不甘落后，随即于《长沙日报》刊出广告，说准于12月16日在长沙育婴街上演“政治新剧《蔡松坡》”，剧中人物包括袁世凯、袁克定、蔡锷、唐继尧、小凤仙、小凤仙的母亲、云吉班主等数十人。^{〔8〕}小凤仙的名字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在各地戏剧舞台和报刊媒体上的。而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能如此神速搬上舞台，也说明他们的交往，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否则，何能在蔡锷去世仅仅四天，至多也不过一个月，就写出剧本，完成排练，公开上演呢？

〔6〕 1916年11月16日《申报》，第4张第16版。

〔7〕 1916年12月4日《申报》，第4张第13版。

〔8〕 1916年12月16日《长沙日报》，第1张。

蔡锷的逝世,揭开了他与小凤仙话题的历史序幕,此后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文艺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依据新的价值观,重提他们这段往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以《英雄美人》为题再次将其搬上舞台。^[9]1948年,又有人写就三幕历史剧《袁世凯》,叙述蔡锷如何逃出北京。^[10]1950年代以后,我国内地虽一度失声,而台港澳地区却热度不减,1953年香港推出电影《小凤仙》,饰演小凤仙的李丽华一炮打响,成了耀眼的电影明星。1981年10月,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拍成电影《知音》,在全国各地上映,风靡一时,扮演蔡锷的王心刚还因此荣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与此同时,以此为题材的各类戏剧节目,如话剧《一代风流》、同名京剧与越剧《蔡锷与小凤仙》、其他剧种《大将军与小凤仙》,等等,也在各地纷纷上演。稍后,刘晓庆又集资拍摄了由其亲自饰演小凤仙的电视连续剧《逃之恋》,长达30集。这些戏剧影视节目,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感染力量,不但使蔡锷的英名重放光彩,也使小凤仙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众多蔡锷“粉丝”,对这一历史话题津津乐道,谈论不休。打开Google(谷歌)网页,输入“蔡锷与小凤仙”6字,竟可搜寻到数万条相关信息。学术界的状况似较影视戏剧界略显寂寞,检视当今各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如《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对蔡锷与小凤仙这桩历史公案几无只字提及。^[11]但也有多种离不开这一话题的论著问世,仅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有多家出版社推出《蔡锷传》,并首次出版了专题著作《护国运动史》,至于相关文章就更多了,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为了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知音》和戏剧之余,能观其戏而知其人,“就历史写了《小凤仙其人》”、《再谈小凤仙》两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2]

这些戏剧影视节目和学术论著意在告诉人们什么?娱乐之外还有没有共同的思想指向?除少数学术论著对个别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的讨论外,多数舆论在主要问题上的认识似已取得一致,那就是小凤仙是“爱国名妓”,云南护国起义的“幕后人物”,蔡锷“最后靠了小凤仙掩护的力量,终究脱离[樊]笼”,“从北京到了……云南”,论起小凤仙“对于国家的功勋”,实在不下于当时的蔡

[9] 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6页。

[10] 《蔡锷如何逃出北京》,《宇宙文摘》第3卷第2期,1948年2月。

[11] 王天奖、刘望龄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说:蔡锷即以赴日就医为由,躲过袁世凯的监视,辗转绕道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越南,历时一月,于12月19日潜抵昆明。只字未提“小凤仙”事(该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张宪文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说:“1915年11月初,蔡逃离北京,到达天津,接着又于11月18日乘轮离津赴日。”也只字未提“小凤仙”事(该书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说:“一切部署停当后,蔡锷、梁启超以治病为由摆脱袁世凯的监视,逃离京津。”同样只字未提“小凤仙”事(该书第1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12] 陈旭麓仙逝后,其弟子编辑纪念文集《陈旭麓文集》时,将上述两文删订连缀成《小凤仙其人》一文。参见《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0—376页。

[13] 邢鹏举：《赛金花和小凤仙——中国近百年史中的两个名妓》，《天地》1944年第6期，第38页。

[14] 《小凤仙其人》，《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0页。

锬，堪称“造时势的巾帼英雄”。^[13]对于蔡锬与小凤仙的关系，则普遍认为他们的“相恋”，“并非乌有，确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则佳话，富有传奇色彩”。^[14]经过众多戏剧影视节目的渲染，这些基本看法更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以为这就是蔡锬和小凤仙的真实历史。

然而，这些共识有可靠的事实根据吗？历史的真相是这样吗？小凤仙和蔡锬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她掩护蔡锬脱险京津的吗？既然蔡锬与小凤仙一事历来是社会的热门话题，近年更是被互联网炒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那么，作为历史研究者便不能无动于衷，一味三缄其口，采取回避态度，或者模棱两可，搪塞了事，而应努力追求历史的真实，对其做出符合或者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否则，任凭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社会共识”不胫而走，久而久之，就会为某些好走偏锋，轻视有案可稽的文献资料，片面强调应从“历史传闻”中寻找“历史真相”的所谓“创新”高手提供更多的依据，使这桩历史公案成为更加离奇复杂、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这是我所以步人后尘，也来凑个热闹，谈谈蔡锬与小凤仙这个热门话题中的的是是非非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戏剧影视作品并不是历史著作，作为艺术自有其追求票房价值，吸引观众眼球，进行虚构、加工、美化的理由，本文对此不予置评，仅从历史学求真求实角度，对蔡锬与小凤仙这一话题作一探求，权当抛砖引玉的个人意见，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 小凤仙的身世

小凤仙这个名字，今天虽已家喻户晓，但人们对她的了解并不多，直到1981年10月，陈旭麓写了《小凤仙其人》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经过多种媒体的传播，才使更多的人有了如下的印象：（1）“她是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2）她在北京云吉班时的年龄，“当是一个17至19岁的姑娘”；（3）“她通文字，能阅书报，这是她比一般妓女较有身价的地方。”^[15]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可信度如何，还有什么新情况，并未深入探究过。陈旭麓这三个推论，基本来源于地理学家、佛学家张相文《南园丛稿》中的

[15] 《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1页。

《小凤仙传》和曾孟朴之子曾虚白所撰《曾孟朴年谱》。有学者指出陈旭麓所据两种“史料可以引用”，理由是张相文《小凤仙传》发表时间“最早，出版于一九一八年”，张相文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绝非‘稗官者流’”。而曾虚白则为“孟朴公之哲嗣，子写父传，应不会作假”。况且“著名报人陶菊隐也承认《曾谱》为‘着实之笔’……所以，三者互证，可以结论”。^[16]

这位学者的史料辨伪意识值得赞赏，但认为依据上述史料就可以以下“结论”了，则不敢完全苟同。以最早的史料作为选用标准当然有一定道理，遗憾的是他未对张相文的《小凤仙传》是否真是发表“最早”，作进一步的调查，仅仅因它发表于1918年^[17]，便轻率宣布为“最早”的。实际上此前的记载多了去了。据我查考，张文其实来源于江苏毗陵（今武进）早期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李定夷的《英雄儿女各千秋》，而李文又来源于前述署名戒甫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一文，请看三文所介绍的小凤仙的身世何其一致。

张相文之文说：

小凤仙，钱塘人。父某清季为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厅靳不许。复携家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凤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媛也。^[18]

李定夷文说：

京妓小凤仙者，杭产也。其父亲任前清武职，以案褫职，家道中落，乃携妻女至沪，市果饼以为生活。旋以食指太多，质女入乐籍。又因女尚年稚，为捕房干涉，禁止营业。遂举家北上，仍张艳帜，名小凤仙。凤仙貌殊美，面作瓜子形，容光白润，态度轻盈，临风玉立，遥望若仙，且工谈吐，精戏曲，解史书。^[19]

戒甫文说：

小凤仙，杭产也……据谓曾任有清武职（按：指其父），以家道中落，携妻女鬻饼沪上，旋质女妓籍。已而，凤仙年过幼，见逐于英捕，遂举家北上。初至，客寥寥……凤仙面作瓜子形，色纯白，体态轻盈，远望若仙子。惜上颚左右有二牙外露，

[16] 余力文：《桃花颜色亦千秋——蔡锷与小凤仙的因缘情》，台北《历史月刊》2001年1月号，第67—68页。

[17] 此说有误，实际是“1929年冬月”，见《南园丛稿》一书封底，北美印刷局民国十八年承印。

[18] 张相文：《南园丛稿·小凤仙传》卷七，北美印刷局民国十八年承印，第47页。

[19] 定夷：《墨隐庐漫墨·英雄儿女各千秋》，《小说新报·谈荟》第3年第7期，1917年7月。

[20] 戒甫：
《蔡公松坡之轶事四
则》，1916年11月
12日《长沙日报·文
艺丛刊二》，第3张
第9版。

开口颇损美观。然近询之自京来者，则云已易金牙矣。又谓凤仙去岁眷于蔡公，名始大噪，盖其时年已二八，玉立翩翩，且工谈吐，精戏曲，解书史。^[20]

以上三文发表的时间，分别为：张相文之文，1929年“冬月”（即农历十一月）；李定夷文，1917年7月；戒甫文，1916年11月12日。发表最早的恰恰不是张相文一文。而是戒甫之文，可见，说张文发表“最早”是没有根据的，以此作为评判张文可信的理由自然不能成立。由此也说明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否则，即如像张相文《小凤仙传》是否“最早”问世这样一个小小的结论也要出纰漏。综观三文内容，不仅意思基本相同，连文字表述也大同小异，其陈陈相因的关系，一目了然。唯一不同的是谭、张两文对小凤仙父亲如何“落职”未作交代，而李文却添油加醋，说是“以案褫职”，至于因何案而“褫职”则不得而知。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文均无只字提及或透露小凤仙的父亲是“旗籍”，陈旭麓仅依据曾虚白后来撰写的《曾孟朴年谱》中的说法，便断定小凤仙为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似有存疑的必要。

作者治学严谨，又是否能成为判断史料可信的条件呢？也须具体分析。一般说来，治学严谨之作，就像名牌产品一样，易让人放心。但严谨作者也只是不会有“造假”的故意而已，毕竟还要受到个人治学时间、精力、情感、环境等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因此，出现某些不依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偏差也并非不可能。就张相文《小凤仙传》而言，除有关小凤仙的身世外，个人以为绝大部分内容都不能轻信（详见下文）。至于说《曾孟朴年谱》因其作者为“孟朴公之哲嗣，子写父传，应不会作假”，则更有讨论余地。为贤者讳，是中国修史的传统，“家丑不可外扬”，至今仍相当有市场，子写父传，就一定不会作假？曾虚白写他的父亲如何对后来名声在外的小凤仙施救，乃是一桩好事、善事，当然不可能隐而不书，但夸大其词则未必不可能。所谓蔡锷对小凤仙有“金屋之议，因小凤仙不易就范，始终没有办法”，蔡知曾孟朴“跟小凤仙夙有渊源，因设法与先生交，以撮合的重任相托，卒经先生从中劝解，成立了这段英雄美人的撮合，也可说是千古佳话了”。^[21]个人以为就是十足的杜撰（详见下文），全然不可信。

[21] 曾虚白：
《曾孟朴年谱》，
转引自《陈旭麓文
集》第3卷《思辨留
踪》，第372页。

这么说来,张相文所述小凤仙的身世,是否意味着不可信呢?倒也不是,只是在辨析方法上存在缺陷而已。其实,张相文所述小凤仙的身世还是相当可信的。因为,第一,不是他杜撰的,有其史料依据,而且来源于堪称发表“最早”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一文;第二,事实证明,《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的记述多数还是比较可信的。

首先,从文中所介绍的蔡锷的处事待人方式看,这位自署“戒甫”的作者似对蔡锷比较关注和了解,甚或还有过直接交往,起码是见过蔡锷。所谓“戒甫”,实际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先秦诸子、楚辞、金文学者谭戒甫,亦名作民,字介夫。他出生于1887年3月,小蔡锷5岁,湖南湘乡(今涟源市)人。1905年入湖南游学预备科,1909年考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10月11日加入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22]。民国成立后,在长沙当过记者,办过报。他在文章中开篇即说:“蔡松坡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和易容众,未尝有迁色。然遇事认真,为广西干部学堂监督时,诸生好辨者,常恶语怒斥之,甚或掴之以掌。其严烈如此。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已!窃虑其不永年也。而竟阨折,惜哉。”^[23]谭戒甫既清楚蔡锷“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等外貌特征,又熟悉他的性格、脾气和处事行为方式等内在气质,可见,对蔡锷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

其次,谭文所记小凤仙以外诸事,除个别事实,如说蔡锷“阳与夫人反目,令携其二子出都”^[24],属道听途说之词,与事实大相径庭外(详见后文),基本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如以上所说蔡锷“生性静默”,“和易容众”,就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看法。与蔡锷一起发动1911年10月30日云南“重九”反清起义的李根源说过,蔡锷“沉默寡言,若有渊识”^[25]。新共和党发起人、国会议员胡鄂公也有类似说法,蔡锷“居恒默默而寡言笑兮,大智渊乎其如愚”^[26]。说明蔡锷的性格的确比较内向,话语不多。又如说蔡锷“爱才如命,随处留心。吾县龚君铁铮,深沉宁静,大蒙奖借。三年冬,为亟筹千元,先容与滇省某公,促其经营矿业。惜龚以他故作罢。迄去冬滇、黔事起,即连致三缄,嘱其在湘省响应。龚故以

[22] 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23] 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4] 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5] 李根源(贺竺生先生代):《祭蔡督军墓文》,《曲石文录》卷4,苏州葑门曲石精庐1932年版,第26页。

[26] 《胡鄂公祭松坡先生文》,《丙辰杂志》第1期,1916年12月。

[27] 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8] 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85页；《1916年谭延闿清理汤芑铭任内各案文件》，《汤芑铭祸湘录》，《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29] 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30] 蒋百里：《蔡公行状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4页。

[31] 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攻督署死。论者谓不负公特达之知焉。然亦足以见公之照奸熟计，殆预料有讨袁之一日也。伟矣哉。”^[27] 经查，龚铁铮与谭戒甫确系同乡，同为湖南湘乡人。所谓“去冬滇黔事起……在湘省响应，龚故以攻督署死”，更是一点不假。乃指1916年2月21日，龚铁铮等数十人为响应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身怀炸弹，冒死攻击长沙汤芑铭将军署，龚与杨王鹏等27人被执，惨遭杀害一事。^[28] 再如说蔡锷平时喜下“围棋，精思妙著，眉色飞舞。观其作势，已知其娴熟略，而善战伐矣。”^[29] 也得到追随蔡锷多年的蒋百里的证实：“公身不魁伟，而绝有力。好弈，终夜不肯休，艺之强者，常以精神不继而负。”^[30] 这些事实足可说明谭戒甫评人论事，忠于客观事实，值得信赖。

再次，谭文所记小凤仙的身世，乃出之于小凤仙的父亲（实际是养父）之口，当有一定可信度。据作者谭戒甫说，他得知小凤仙身世的经过是这样的：“癸丑，予寓都门时，凤仙住陕西巷云吉班，豆蔻年华耳。亡友向君决庵，貌颇寝，为之制衣物百元，即膺殊睐。其母一日邀决庵至私室，晤其父，淪茗谈身世。”而且还“劝决庵纳女为侧室，以终二者余年为请。决庵勿遽却之，未几南返。亡友喻君小南继往，每当游客疏阔时，能座谈数时取乐也。”^[31] 谭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人们，小凤仙的身世，并非他闭门杜撰，是他1913年在北京时，一位叫向决庵的亡友亲口告诉他的，而这位亡友不但亲自接触过小凤仙，而且所述小凤仙的身世还得之于小凤仙的养父之口。虽不能绝对排除小凤仙的养父有意打悲情牌，对小凤仙的经历，添油加醋，以博取听者的同情，但在辛亥革命前后这种大动乱的年代，像小凤仙这样因家道衰落而堕入风尘的事并不稀奇，因此，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所言具有真实性的一面。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其他史料可为佐证。谭文发表后不久，有人投书《盛京时报》，对小凤仙的身世，作了如下介绍：

凤仙张氏，河南人也，其父某粗习文墨，而不得入仕途。

从增子固（按：浙江巡抚增韞，字子固）中丞充文书吏，在杭州数年。其母带携凤仙谒增太夫人，夫人甚宠爱之。辛亥革命事起，抚署被焚，增太夫人因惊惧逝世，增中丞已解职北归。凤仙一家遂贫无所依，于烽火兵燹之余，谋生无路，其母贷凤仙于杭